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个 汉译全译本的译介与论争^{*}

刘从德 吴宜临

[内容提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早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考证发现,该部著作首个汉译全译本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由“托陈取消派”译介到国内的。在论战中,“托陈取消派”试图通过译介和引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为其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等问题上的观点主张作辩护。但是这也暴露了他们歪曲列宁主义、冒充列宁主义门徒的真实面目,在客观上起到了佐证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正确性、促进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更加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作用。

[关键词]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3.04.008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早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目前已有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汉译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概述的形式介绍总结该著作的译介、出版和传播情况,尚缺乏针对具体版本的传播史研究。本文立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个汉译全译本即彭苇秋与杜畏之合译本(以下简称“合译本”),通过详细考证,深入挖掘这部经典巨著在中国第一次完整亮相^①的历史过程。经考证,合译本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诞生的。

^{*} 本文系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独立自主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ZD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完整”是指对第一、二版序言、正文和附录等部分的内容翻译完整,但不包含脚注部分。该译本从第四章开始删除了列宁在原文中所作的大量脚注。对于删除的原因,彭苇秋和杜畏之在译者序中作了说明,他们说道:“删去的原因,是这些注解丝毫不能帮助读者,并不能加深读者研究与探索的兴趣,因为这些著作很多是俄国特有的,而且是旧有的著作,不但在中国找不到,便是各国文字也找不到,即到苏联本国也要到较大的图书馆中才可找到。加上这些东西,反而使读者更加混乱”。参见[苏]乌里雅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春秋书店 1930 年版第 3 页。

“托陈取消派”^①试图通过译介和引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为其观点主张作辩护,与“新思潮派”^②进行论战。因而,本文也将通过对合译本的考证,来揭示“托陈取消派”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社会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之间关系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他们搬来的这柄理论“大斧”^③恰恰成为验明其自身血统的“照妖镜”。

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个汉译全译本及其译者考证

研究者普遍认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最早的汉译全译本是彭苇秋与杜畏之的合译本。如著名翻译史学家马祖毅认为“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下卷的首次中译文是由上海春秋书店出版的。1930年10月,出版了上卷,彭苇秋、杜畏之译,书前有译者序。1932年8月1日,上海新生命书局予以再版。下卷于1933年4月出版,至今未见。”^④曹鹤龙主编的《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中译文有七种,^⑤并按照翻译出版的时间先后顺序对各版本分别作了简要介绍,其中彭苇秋与杜畏之的合译本排在首位。刘长军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读本》中肯定了马祖毅和曹鹤龙等研究者的考证,并明确提出彭苇秋与杜畏之的合译本是“第一个全译本”。^⑥合译本是上下两卷的全译本,上卷内容包括译者序、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和正文第一章至第四章,下卷内容包括正文第五章至第八章以及附录。据译者在书中所述,合译本翻译的底本是“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出版的国家书店的新版”,而“新版是加未涅夫根据第二版而校对过的”。^⑦经过版本考证,该译本的上卷于1930年10月12日由春秋书店首次出版,于1932年8月1日由新生命书局再版发行,该版除封面外,内容与1930年春秋书店出版的完全一致,而下卷则是于1933年4月10日由新生命书局首次出版发行。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从篇幅来看,包括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正文八章、附录等部分,共计47万字之多;从内容来看,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论述,也有对俄国资本主义实际发展过程的分析和总结;从涉及的文獻资料来看,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特别是《资本论》,也包括普列汉诺夫、俄国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等的相关论著,以及大量关于旧俄国各省、县、地区的各类经济发展情况的数据统计资料。该部著作体量大、内容极其丰富,翻译难度极大,需要译者精通俄语,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经济学知识,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具备此等翻译能力的人还很少。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就是上下卷首次出版时间为何相隔三年之久?要找到问题的答案,就需要对该译本本身和译者生平进行考证。

杜畏之原名屠庆祺,生于河南永城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杜畏之”是其1930年后写文章时用的笔名。1919年,杜畏之考取了开封欧美留学预备学校,但由于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形势恶化,所以留学未能成行,便改道去南京东南大学和开封中州大学读书。1925年初,杜畏之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入学后,由于在国内曾学过英语和俄语并且水平较高,杜畏之被分到俄语班。据同样曾有过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经历的伍修权在其著作《回忆与怀念》中介绍,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

① “取消派”在俄国是指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的代表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派别;在中国则是指“托陈取消派”。“托陈取消派”是陈独秀等人堕落后为取消主义者后,与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相勾结而形成的一个反党派别,又名“‘无产者社’派”,主张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见解。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干预下,“托陈取消派”同国内另外三个托派组织即“我们的话”“十月社”“战斗社”联合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国托派统一组织,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左派反对派”)。

② “新思潮派”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新思潮》杂志为主阵地的先进社会科学工作者群体。

③ [苏]乌里雅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春秋书店1930年版第2页。

④ 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需要指出的是,经过版本考证,笔者并未发现春秋书店出版过下卷,仅找到由新生命书局在1933年4月出版的下卷。

⑤ 参见曹鹤龙主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⑥ 参见刘长军《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92—98页。

⑦ [苏]乌里雅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春秋书店1930年版第3页。

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①。学习这些课程无疑为杜畏之后来翻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储备。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学员。在校期间,杜畏之利用优越的外语学习条件,学会了德语、法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多门语言,尤其精通英、俄、德、法四门语言。^②

列宁去世以后,联共(布)内部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有根本对立意见的两派,即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苏共的反托派斗争也波及到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形成了支持斯大林的联共中央路线和支持托派观点的两个队伍。当时,在拥护托派观点的同学中,有一部分是被托洛茨基的才气和知识分子气度所吸引的、脱离实际的分子,他们经常捧着列宁著作,一面翻书一面发言,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为托派辩护。^③据曾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委的濮清泉^④所述,在1927年“红场事件”之前,杜畏之就是对托派理论抱有好感的同情者^⑤。

1927年底和1929年,有一部分受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中国留苏学生陆续返回国内,从事托派活动,着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和观点。1929年春,当陈独秀、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后,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认同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独秀等人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取消主义的见解。1929年秋,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何资深等纠合高语罕、李季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名为“无产者社”的托派组织(也就是“托陈取消派”),宣称共产国际和中共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不革命了,中国革命要由“无产者社”来承担,并在他们创办的刊物《无产者》上登载了许多托洛茨基的论著。也是在这一年,杜畏之回到上海,随后加入了“无产者社”,并在《无产者》上发表过文章。1931年5月,四个托派小组织即“无产者社”“我们的话”“十月社”“战斗社”联合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国托派统一组织,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

对派”。此后,杜畏之经朋友介绍,到安徽大学就职,担任哲学系教授。“统一大会”后不久,由于内部派系矛盾,中国托派很快陷入分裂,遭到国民党的两次大破坏,形成了混乱、瘫痪的局面。^⑥但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并没有放弃。1932年7月2日,出于经济上的拮据和安全上的考虑等原因,彭述之致电杜畏之,通知他到位于沪西的兆丰公园碰头,同其与李季、吴继严^⑦商量宣传工作。会后,吴继严和杜畏之结伴而行,走到公园门口时正好遇见了当时已叛变的顾顺章,遂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进警察局。经过审问,虽然证实二人是托派成员,但同样要被判刑。在得知杜畏之被捕的消息后,其就职的安徽大学托关系再三活动,于1932年底将其保释出狱。^⑧这或许是导致杜畏之、彭苇秋翻译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卷直到1933年4月才出版的主要原因。

目前关于另一位译者彭苇秋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甚少,但通过合译本中译者序的内容可以了解其观点主张,从而可以知悉其基本身份。合译本中译者序写道“风行一时的新思潮月刊,其理论之野生性与对中国经济分析的胡柴^⑨真是到了绝顶。不少的朋友已正式向他们宣战,已发生了小的冲突;我们却趁这个时间把乌利雅诺夫的大斧从俄罗斯搬运过来用阔大的挥舞去斩杀这些冒充门徒的小妖。这些东西将要看到这大斧的威风。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② 参见吴基民《“托派”杜畏之的坎坷人生》,载于《世纪》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④ 濮清泉又名濮德治、濮一凡,安徽安庆人,与陈独秀是表兄弟关系,并且一生追随陈独秀。

⑤ 参见孙会修《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托派研究(1926—1930)》,载于《苏区研究》2021年第4期。

⑥ 参见濮清泉《中国托派的产生与灭亡》,载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4卷第7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82—85页。

⑦ 孙会修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托派研究(1926—1930)》和吴基民在《“托派”杜畏之的坎坷人生》中使用的均是“吴季严”,而濮清泉在《中国托派的产生与灭亡》中则写为“吴继严(陈独秀的外甥,安徽怀宁人)”。本文鉴于濮清泉曾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历史亲历者,因此使用“吴继严”。

⑧ 参见吴基民《“托派”杜畏之的坎坷人生》,载于《世纪》2004年第1期。

⑨ 原文如此,意指胡说——作者注。

会知道这大斧当年所解决的蠢东西正是他们的同宗,而乌利雅诺夫当年的对手民粹派的血还有很多在新思潮派的脉管中流着。这大斧会来验血,而验血的结果将证明新思潮派是个何等复杂的混血儿,有何等显著的野生性,——告诉他们马氏家谱中再也不会将他们的名字填入。这大斧便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乌利雅诺夫最重要著作之一。”^①

可以明显看出,该译本是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应运而生的,而译者彭苇秋和杜畏之在当时确实是站在共产党的反对派队伍中,为其中之一的“托陈取消派”说话,他们自诩为“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个别段落、语句,一方面作为他们断言“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为指证中国共产党和先进知识分子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以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之方法的“错误”的有力凭证。虽然他们译介该书时的主观目的是反动的,但也在客观上使得这一经典巨著第一次在中国完整亮相,促进了这部著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二、译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引发的争论

1926—1928年,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等问题曾展开大争论。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虽然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关系即所谓农奴制和半农奴制关系,但“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它“无可争议地起着主导作用”,只是在发展程度上中国的资本主义比俄国更为落后,而这种落后正是“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的基础”,^②“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势力的根本来源”是“经济上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与外资相连”,^③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不会导致全中国各阶级的一致对抗,而且还会加剧阶级冲突。由此,托洛茨基等人提出要在民主革命时期开展阶级斗争。针对这种观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封建势力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帝国主义就是通过扶持它们来实现对中国的统治,因而中国是有许多半封建制度残余的受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中

国革命的任务应是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中国还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被尖锐地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而要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192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1928年中共六大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前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争论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全盘接受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主张,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由此出发提出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待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错误思想观点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契合了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等反动政治流派的论调,产生了分裂党、削弱革命力量等恶劣影响。正因如此,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号召全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与“托陈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肃清托派思想和机会主义残余。^④

为系统地批驳“托陈取消派”的纲领及其反动理论,1929年12月,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全面论证了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对“托陈取消派”的谬论作了有力批判。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中共在此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基本理论。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其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便组织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革命文化团体“创造社”

① [苏]乌里雅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春秋书店1930年版第2—3页。

② [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122页。

③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8页。

④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411页。

创办的刊物《新思潮》为主要阵地,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表论文,对“托陈取消派”等反动政治流派的各种谬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详细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理论和主张。要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必然要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第五期出版了论战专号“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①、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之后,在第六、七期^②上又继续刊登了多篇相关文章。上述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以《新思潮》为主阵地,所以在当时被称为“新思潮派”。

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后,立时遭到托派分子严灵峰和任曙等人的反扑。严灵峰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并在那时就已加入托派,回国后又加入了赵济、王平一、徐乃达等人在上海成立的托派小组织“战斗社”。1930年7月,严灵峰参与创办《动力》杂志,该杂志只出版两期。为宣扬托派观点,反驳李立三和“新思潮派”,特别是反驳“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上发表的潘东周和王学文的文章,严灵峰在1930年7月15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的文章,之后,又在9月30日出版的第二期上发表了《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一文。这两篇文章都继承了中山大学托派的传统说理方式——“照本宣科”“断章取义”,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没有进行实际而详细的考察和分析的情况下,仅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作为理论支撑,来论证其“中国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③的观点,否认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污蔑李立三和“新思潮派”为“马克思主义新修正派”和“上世纪的民粹派”。此后,严灵峰又写了《我们的反批评》一文,与前述两篇合在一起,加上一个序言,编成《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于1931

年6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并于1932年又写了《追击与反攻》一书。任曙本名任旭,大革命时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共中央农民部秘书、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党团书记等职,1928—1929年间加入“托陈取消派”。1930年12月间,任曙写了《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书,并于1931年1月出版,1932年2月又出版了修订版。严灵峰和任曙虽然在某些枝节问题上有过争论甚至对骂,但在关键和根本的问题上,两人观点完全一致,都认为帝国主义会破坏封建势力,应同等看待中外资本,因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发展就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

面对“托陈取消派”及其他托派分子发动的猖狂反扑,代表马克思主义者一方的“新思潮派”又随即展开坚决斗争,但由于《新思潮》在1930年7月出版第七期后便被封禁,所以只能转战到其他刊物,包括党的刊物《布尔塞维克》、公开出版的《读书杂志》《读者》等刊物上继续发表批判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伯虎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刘苏华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总的来看,论战双方为辨明中国究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主要围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就何者居优势地位、主导地位展开争论。^④

虽然彭苇秋和杜畏之没有在《动力》上发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但同为“托陈取消派”成员的他们,也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歪曲马列主义,企图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① 《新思潮》发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时,在目录页的署名是王学文,在具体文章中的署名则为王昂。

② 这里所说的《新思潮》第7期即是《新思想》的第1期。《新思潮》在出版第6期之后,就被敌人查禁,后改名为《新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领导下的一个刊物。《新思想》出了一期后也被查禁。参见徐素华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0—91页。

③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④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

展》这一巨著作为与“新思潮派”论战最有力的武器,期望以此来指证“新思潮派”观点的“错误”及其研究、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的“错误”,这在合译本的译者序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国农业资本主义之发展已成彰明较著的事实,而中国的民粹派,中国的农民思想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偏偏看不见,而且不愿看见这个事实,只闭着眼睛喊封建制度来替中国农村资产阶级哭穷。‘封建优势’的论调不但是替资产阶级哭穷,而且这种分析必然使工人政党在乡村中的政策陷入泥沼。他必然过份看轻农村无产阶级的作用与角色,必然对农村资产阶级存有奢望,必然使政策妥协右倾而使革命运动重受到挫折。”^①与此同时,彭苇秋和杜畏之在翻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过程中,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对个别语句的翻译出现了不尊重原文的现象,且这些背离并不是翻译技术和理论理解层面上的误译,而是政治观点驱使下故意而为的篡改。比如,在翻译第二章《农民的分化》第一节的内容时,两位译者就对原文中的下面这段话作了明显改动(见表1)。

表 1

彭杜合译本	现行权威译本 ^②
农业资产阶级是商业资本(抵押土地出放货币,购买各种不同的生产物等等)与工业资本(雇用工人经营商业农作)的汇流。我国乡村究竟能否脱离此环境;能否排除此亚洲的形式,在文化上能否得到相当的普及,这全看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在发展中彼此的消长如何而定。 ^③	农民资产阶级手中掌握了商业资本(以土地作抵押出借款项,收购各种产品等等)和产业资本(靠雇用工人来经营的商业性农业等等)的两条线。这两种形式的资本中,哪一种资本会由于另一种资本的减少而增长,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取决于我国农村中的落后现象被排除的程度和文化普及的程度。 ^④

较之与现行权威译本,可以明显看出,该语段在合译本中,除了存在颠倒逻辑关系的误译(即将农村落后现象被排出的程度与文化普及程度决定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此消彼长,译为后者决定前者)外,还以“亚洲的形式”来代替原文所说的俄国农村中的“落后现象”。显然,这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词语,这种改动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农村社会经济状况与俄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直接等同起来,无疑会对当时阅读该合译本的读者造成思想上的误导。可以说,严灵峰和任曙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引用,与彭

苇秋和杜畏之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译介,都体现出“托陈取消派”对于列宁观点引用的非客观性。

三、从论战看译者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歪曲利用

在论战中,“托陈取消派”及其他托派分子通过引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个别段落来论证其观点,并宣称“新思潮派”是“上世纪的民粹派”“俄国民粹派的同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新思潮派”与俄国民粹派有着相同的思想观点,在研究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分析国家社会性质问题上犯了相同的错误。那么他们所言究竟对否?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辨明这一问题,下文将围绕“托陈取消派”及其他托派分子与“新思潮派”争论的具体内容,来揭示他们是如何以引经据典的方式歪曲列宁主义的。

(一) 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论

“新思潮派”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某些资本主义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其“经济的附庸”,它不仅不会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而且会阻碍其独立发展,它不仅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⑤帝国主义加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极力扶持封建势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⑥对此,严灵峰认为,“新思潮派”

① [苏] 乌里雅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 春秋书店 1930 年版第 17 页。
② 指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3 卷。
③ [苏] 乌里雅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 春秋书店 1930 年版第 59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3 卷第 61 页。
⑤ 参见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29 页。
⑥ 参见李立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7—135 页。

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如出一辙,两者差别仅在于俄国民粹派是以缺乏国内市场为论据认定俄国资本主义将走向衰落,而“新思潮派”则是“以帝国主义只是取得中国商品市场,保持封建势力的论据,来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①。随后,严灵峰模仿列宁对民粹派只看到由个人消费形成的市场并将其作为市场的全部,没有看到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而提出国内市场缺乏论所作的批判,对“新思潮派”进行反击。他把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某些原料的事实作为证明国内生产资料市场发展的根据,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他仅仅凭借来源不明、未经证实的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在1927年7—12月和1928年的7—12月对华输入的棉纱量和增减百分比,就做出了帝国主义供给原料来帮助中国发展轻工业的结论,并提出帝国主义在侵略过程中会“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趋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独立与否,是不能破坏和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法则的”,“无论如何不能说中国社会可因帝国主义的统治而逃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律”。^②实际上,列宁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市场是这样形成的:从破产的小生产者手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从而自身也变成了商品,由此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③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市场是从国家内部经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托派分子则把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入原料看做国内生产资料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与此同时,在这里也可明显看出严灵峰对数据的引用和分析缺乏严谨科学的态度。列宁批判民粹派时就指出,他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有意避开反映真实情况的数据资料,并用奇特的数据分析方法作论证,这也是严灵峰等人行为的生动写照。

(二) 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托陈取消派”及其他托派分子捏造出“两个同等”的概念,即对中外资本主义要“一视同仁”和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并在此基础上,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论证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势力已成为“残余之残余”。同时,他们还有选择性地摘取列宁

在分析那些表明俄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发达的萌芽状态的现象时,对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关系而作的一部分论述,作为支撑他们关于封建势力已衰败这一观点的思想依据。严灵峰说道“高利贷资本在中国农村的发达,并不是因为封建制度基础坚固的结果,反而是因为农村中侵入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经济不断的发展使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增加,因此更加剧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封建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最终会破坏封建经济的基础,促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发点和必要的前提。所以,在中国今日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发达并不能机械的证明封建经济的强盛与发展”。^④实际上,列宁认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都不能构成产生产业资本的足够条件,两者并不经常瓦解旧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们只充当产业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换言之,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所必然具有的因素,不能把它们的蓬勃发展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瓦解的标志。同时,列宁还指出了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对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即这两种落后资本的独立发展阻碍了农民的分化,阻碍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托派分子根本没有真正理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列宁思想的精髓。

(三)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论争

资本主义经济已在中国存在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是“新思潮派”与“托陈取消派”双方都承认的事实,但他们的分歧之处在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托陈取消派”认为帝国主义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势力,必然促进中国

①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② 参见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386—387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3卷第51页。

④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6页。

资本主义按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突飞猛进地发展。任曙说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①另外,他们引用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论述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部分论述,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都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因而中国也必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华洋资本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不分彼此,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就必然占领导地位。严灵峰认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经济发展趋势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至于某些特殊情形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一般的法则来说明,而不能以特殊情形来否认一般的法则!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特征的认识与不肖门徒的认识,主要的分野就在这里”^②。在“托陈取消派”那里,统一是没有对立和差别的绝对统一,特殊与一般是相对立的,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懂得唯物辩证法,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忽视中苏(俄)两国国情的差别,忽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列宁在批判民粹派时,就曾指出民粹派以一般资本主义来看待俄国特殊的资本主义的错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托陈取消派”与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此,“新思潮派”提出,“托陈取消派”只知道物的统一,而不知道统一中的对立和差别,决不能把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即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等量齐观,而应该看到前者压迫后者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清楚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才能明白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封建势力仍然保持着,并且在分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得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独立发展前途的结论。^③

上述内容证明,“托陈取消派”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时,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没有掌握大量且有效的统计材料和科学数据分析方法的情况下,教条地对待列宁主义,把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研究结论直接用于理解中国社会,得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结论。这把从苏联舶来的“大斧”不仅不能证明“新思潮派”是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同宗,反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佐证中国共产党理论正确性、促进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更加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作用,使“托陈取消派”及其他托派分子露出他们“冒充门徒的小妖”^④的真面目。

[作者单位]刘从德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吴宜临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蔡向宇]

①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5页。

②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载于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376页。

③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④ [苏]乌里雅诺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春秋书店1930年版第2页。